

第一章 考察的视角

对福泽谕吉的研究，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1898年《时事新报》^①社编的《福泽谕吉全集》5卷本问世以来，又有该社编的《福泽谕吉全集》10卷本（1925—1926年）庆应义塾^②编的《续福泽谕吉全集》7卷本（1933—1934年）和搜集了几乎所有相关资料的《福泽谕吉全集》21卷本（1958—1964年）等先

《时事新报》，1882年福泽谕吉创办，为日本明治、大正年间第一流的报纸，昭和年间并入《东京日日新闻》，战后一度复刊，但不久又与《产业经济新闻》合并。——译者

② 庆应义塾，福泽谕吉于1858年创办的私立学校，1868年以当时的年号命名为庆应义塾，1890年设大学部，1903年改称庆应义塾大学。——译者

后出版。研究论著也可谓汗牛充栋，这方面的索引有昆野和七的《福泽谕吉关系文献总目录》^①和会田仓吉的《福泽先生关系文献目录稿》^②。后者我没看过，据说毕集了有关的文献。

尽管如此，对福泽思想的历史评价至今没有定论。这主要与福泽思想及其表达方式的特点有关。福泽系统地表述自己思想的论著可以说只有《文明论概略》这一部，而他为数甚丰的著述的主要部分，是关于时事的评论。由于各时期的政治、思想状况不同，也由于福泽对此的态度和侧重不同，因而他主张的内容也有所变化。在某个时期，他强调民权；在另一时期，他又专倡国权。在某个场合，他积极主张对政府进行批评和抵抗；在另一场合，他又全力论证官民调和的合理性。概言之，在他的思想中，既有介绍、借用欧美思想的成份，也有结合日本现实对外来思想予以改造或独创的因素，两者溶为一体，很难截然区分，这正是福泽思想的特色所在。并且，欧美的思想与日本

① 载《史学》，第24卷2、3号，1950年10月。

② 载《塾史》，1955年3月、1956年3月、1957年4月、1958年5月、1959年11—12月、1962年9月号。

的现实本来就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那末，福泽思想的真谛究竟何在？对此，不同的读者理解各异，这一点，也反映出福泽思想的特性。而福泽本人似乎执笔时就意识到读者对自己的论旨会有各种各样的接受方式。因此甚至可以认为，一百个人就会有一百种福泽观。

我对福泽产生兴趣并开始研究他的思想，是为下面各位先学的研究成果触发的。这些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作两类。

第一类侧重从意识形态方面考察。它从这样一种视角出发，即考察福泽以怎样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发表了哪些言论，而这些言论又有什么历史作用。羽仁五郎的《白石·谕吉》（1937年）即为这类研究的典型。羽仁比较注意福泽在统治者与人民这一历史基本矛盾中所处的位置，并基于对福泽在哪些问题上能自觉地坚持自主自由的原则、站于人民的立场的分析，探求他所以形成独特的思想体系的原因，同时也揭示了福泽由于没能完全摆脱土族的局限而彻底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致使反封建的主张不时动摇，没能一以贯之的缘由。“正因为这场人民运动是自下而上推进的，福泽谕吉对封建主义的不满、批评，以及借助洋学促进文明事业的愿望，才没有仅仅停留于不满或因中途

受挫而出现波动，并还超越许多先觉者的局限，最先确立不可动摇的原则和实现这个原则的严密的组织体系，奔泻出不可遏止的激流”但“在封建统治的沉重压迫下，福泽谕吉推进人民文明的努力逐渐偏重于有产者市民的文明，从而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背离了他自己的初衷，出现了与封建残余妥协的倾向。这是因为，福泽的人民观念以至社会观念，内涵十分不明确，所以当主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时，便出现了上述偏向”。（271—376页）

家永三郎认为，福泽以与“封建性”斗争而使日本完成“近代化”作为毕生奋斗的事业，但他的最终目标即近代化的实质，不过是在日本确立资产阶级的领导，拥护资本家，反对均平富，而决非建设无条件的自由平等的社会^①。

服部之总的福泽观^②大体上属于第一类，但具体观点与羽仁等有明显区别。他指出：“福泽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主体而言，在于研究者因过于钦佩福泽，以致无法达到对福泽的真实认识。”对福泽的钦佩”不仅

① 《福泽谕吉的阶级意识》，载《近代精神和它的界限》，1950年。

② 《福泽谕吉》，载《服部之总著作集》，第6卷。

表现在羽仁以及下面将要介绍的丸山真男的著作中，我的论稿也存在这种倾向。服部认为，包括福泽在内的明六社^①同人介绍的泰西文明思想，“在欧洲是作为与绝对主义^②斗争的武器产生的，但在日本却成了维护绝对主义权力的武器”。服部以福泽在1879年7月发表的《国会论》为例，指出该文实际上起到了对某个特定阶层出谋划策的政治作用，“这是福泽值明治绝对主义危机之际，为政府拟制的笼络政策，即以后的改进党纲领”。并说：“我始终认为，福泽谕吉的节操和人格，他的思想体系和全部行为，决不是民主主义的，与18世纪的英国人也毫无共通之处；更不是什么纯粹的英

明六社，1873年由森有礼等人发起组织的文化团体。发行《明六杂志》，进行思想启蒙。后因政府的言论统制而解散。——译者

② 绝对主义，这里指赋与君主至高权力的专制政治形态。17、18世纪欧洲出现过的绝对主义君主政体即为其典型。它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资产阶级不断成长，封建主阶级地位下降但又力图维持其统治，双方势均力敌的产物。绝对主义专制王权一面依靠这两个阶级，不偏向任何一方，一面又有其“相对独立性”。日本一部分史学家认为明治维新后建立的日本天皇制即属这样一种“特殊权力”。——译者

美式新兴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典型的市民自由主义，应该说它一贯属于绝对主义的范畴。这种观点是经得住充分论证的。”

第二类研究者的视野往往更集中体现在福泽对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具体问题的态度和批评中的思维方法和价值意义，并由此探求他思想的特色。其前驱可追溯到大正年间倡导实用主义哲学的田中王堂（1915年）。田中王堂在《福泽谕吉》一书中说：“恪守固陋者和热衷破坏者似位于两个极端，而筹划改造者好象站在两者中间，其实不然。在这种场合，改造者与恪守固陋者、热衷破坏者，才是真正对立的双方。或为保守，或为破坏，这不过是由于人的气质不同所致，但在欠缺审时度势的睿智和策略这一点，两者又完全相同。而有审时度势的睿智和策略者，必然是既尊重现实又不断对此进行改造的现实者。福泽就是这样一位既尊重现实、又积极谋求改造现实的人。田中指出，福泽对生活的看法有这样几个特征：（1）实验性，（2）干预性，（3）进化论，即“所有事物的意义或价值都不是绝对不变的，它完全由人们对该事物的态度和兴趣而定”；因此“他的计划任何时候都是彻底的，但又不是激进的，我以为这很自然，也是他没有变成民

众的煽动者，而成为国民的启蒙者的原因^①。

丸山真男发展了田中的见解^②。人们通常把福泽关于“实学”的主张理解成学问的实用性，即把它看成是一种庸俗的现实功利精神和庸俗的唯物主义，或者是一种偏重自然科学的思想。丸山则认为，福泽实学观的特点在体现于实验精神中的主体自觉的理性行为性格。而肯定价值判断的相对性，不把事物的价值看作是内在于事物本身的固定不变的性质，认为事物的价值取决于它对具体环境的功能，这就是福泽思维方法的特征。对实用主义的灵活性的这一强调，也就构成了对主体能动性的尊重。

在对福泽思想的所谓‘局限’的理解上最清楚地表明了两类研究的不同点。第一类研究将福泽未能彻底站在人民的立场支持‘激进’行为和革命一事，或如羽仁那样视作福泽思想的“波折”或如服部那样看成是绝对主义思想家的本质。然两者分析的重点是一致的。第二类

《福泽谕吉》第3章，收于《明治文学全集》第八卷《福泽谕吉集》，这里即据此引用。

《福泽“实学”的转变》，载《东洋文化研究》第3期，1947年；《福泽谕吉的哲学》，载《国家学会杂志》61卷，第3期，1951年，收于《现代日本思想大系》第34卷近代主义。

研究则能够从福泽关于独立自主的反封建主张所反映出来的思维方法入手，统一把握上述的“波折”和“不彻底”，将此看作是他的价值判断相对性的主张和实验精神的必然表现。

与此相关，第一类研究认为福泽思想是随历史的推移不断变化的（是立场变化，还是观点变化，那结论是不同的），而第二类研究则往往强调，虽然福泽的言论前后不一，然其思维方法的结构却处于恒定状态。丸山特别指出：“本稿（前引《福泽谕吉的哲学》——著者）以福泽毕生一以贯之的思维方法为课题，并不涉及他的思想随时代而发生的变迁。毋庸讳言，福泽的思想和立场是随时代发展、变化的。这种变化在一些场合并不缘由他的基本思维方法，在另一些场合却又是他的基本思维方法的产物。后者当然是本稿所要论及的主题，而前者则不在本稿的考察范围之内。”诚然，如要考察思维方法并深入到思维结构内部，那可以说福泽的基本思维方法大体上是前后一贯的，然而他的思想内容和态度却又不可能不发生变化，因此，应该把思想的历史作用的演变置于考察之外。如把思想内容的变化作为问题，考察就势必趋近第一类。

从第二章开始，将探讨福泽思想演变的

体内容。我倾向这样的观点，即应该特别重视思想演变的背景。正如丸山指出的“涉及社会、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的具体批评都是针对当时的现实提出的药方，如果撇开现实，就无法理解这些批评”。丸山在此提及的现实，是指日本从封建社会到近代社会，从近代改革到帝国主义反动这一历史激变过程。照福泽的话说，他一生经历了两个乃至三个时代。福泽作为既非激进又非反动的渐进主义者，却始终处于指导明治国家前进的先觉者地位，如要探究这一奇特的现象，我们就无法否认一个事实 那就是福泽的思想特性恰恰在于能不断地改变思想内容以积极适应变化着的具体情况 而这种 思想内容的改变并不影响他的基本观点”。

羽仁在判别福泽思想的进步和“波折”时，始终把前者看作福泽思想的本质。对于福泽曾将日清战争^① 当作文明对野蛮的正义之战予以支持一事 羽仁不同意这种说法：“因日清战争激起的昂奋所带来的言行，从根本上表明了福泽的思想本质。”同时，他也反对那样的观点：“当福泽处于健康、公正、强壮之时，往往

日 清 战 争（1894—1895），即中日甲午战争。——译者

不对人或思想加以判断，而当他处于病态、狂热、急弱之时，才作出判断。（前引书）福泽的日清战争义战论不是为一时昂扬而发。在日清战争爆发的十年前发表的《脱亚论》（1884年）和《东洋政略果真如何》（1882年）中，他已有类似的论述，进而追溯，《时事小言》（1881年）也有同样的思想倾向，福泽在把“天然的自由民权论”归结为“正道”的同时，却自称崇奉作为“权道”的“人为国权论”，于是，上述著作中的观点就与羽仁所说的产生于福泽“健康而充满活力地生活、活动、思想、著述的时期”的《文明论概略》的论点具有一致性。真要如此，那就无法截然判明福泽思想的进步和“波折”，也难以区分哪些属于他思想的本质，哪些不过是一时的迷蒙和倒退。

福泽的思维方式具有一贯性，因此，可以称之为有体系有原则的思想家。但不能把《文明论概略》与《时事小言》、《脱亚论》及日清战争义战论视作同一，看成是同样的思想在变化了的情况下的不同表述，而应该理解为是一有序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演进过程。丸山曾在其他文章中谈到国际政治论的质变也会对国内政治论产生重大的影响，“构成国内政治理论基础的政治原理大体上具有连续性，只是在将它运

用于具体现实时，侧重点有所不同；相反，国际政治论中立论的变化不一定涉及对具体问题的处理方法，却会深刻地影响理论的内在逻辑。由于福泽一直持国际论优先于国内论的观点，故国际政治论的变化必然会冲击国内政治论。作为他全部政治思想的特色的时代精神正缘起于此。”

我认为福泽的思想确曾发生过影响其理论深层逻辑的变化。但对丸山关于福泽的国内政治论大体具有连续性而国际政治论则是不断变化的这一见解，我仍有疑虑。福泽思想的特色，在于“他的国内政治论与国际政治论，或民权论与国权论之间，不仅有着甚密的内在联系，而且能够互相协调。的确，他几乎毕生都坚持外事优先的观点，但不能把这简单地归结为福泽的“国际论优先于国内论”。福泽一面为了国权而主张国民的自由自立以及官民调和，一面又为了民权以及官民调和而主张国权，并在这两者的不断交替中展开他的国内政治论及国际政治论。对于福泽国际政治论的逻辑转换，仅仅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是很难解释得通的。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从国内的政治状况和

① 《福泽谕吉选集》第4卷题解，1952年

福泽对此的态度着手，反而能正确地把握上述逻辑转换的原因。福泽的国内政治论也时常发生理论深层逻辑的变化。

在福泽研究上，羽仁和丸山的观点和分析方法基本上是对立的，但两人都肯定福泽是近代民主主义思想家。这是因为，他们的研究都是以批评和抵抗战前的法西斯主义为基点的。他们试图通过对福泽思想的探讨，克服种种不利现代化的社会弊端，诸如国家压制国民自由自主的要求，政府权力无所不至地全面干预国民的活动、生活、思想和道德，以及否定价值多元性、对思想界和学术界实行强权统治，同时对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复古主义和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展开批评，进而阐述作为近代出发点的自主、独立、自由的思想。

考察和研究数十年前的福泽思想，意义究竟何在？我以为有两种相互关联但仍有细微差别的态度。一种是把福泽思想理解为今天国民应予传承的文化遗产。也即为弄清楚福泽思想中哪些是至今仍有生命力、有助于现代社会的内容，而去接触和理解他的著作。丸山指出，为了探求福泽的思维方法和价值意识的特征，比起停留在他的文论的表面，更应该注重其文论的内在逻辑；为此 我不得不以重新组合的

方法，再一次对他的论著进行剖析。”的确。将福泽的观点和见解重新组合，在此基础上作出新的解释，这种方法是不可或缺的。羽仁也是通过对福泽浩瀚的著作按不同的课题、观点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把他的思想区分为进步和‘波折’两个方面。羽仁这样的剖析和组合的作业也构成其主要的研究方法。

再一个态度是通过探讨福泽思想，弄清那个时代的思想动向及其特色，从而把握历史的总体趋向。这类历史研究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不用说它可以接近福泽思想本身，但在研究时却不将福泽思想作为直接的课题，说的极端一点，只是把福泽思想权作探讨历史发展规律的史料。在这种场合，应该尽量避免随意肢解他的著作。所以要特别重视著作的年代，把它作为历史考察的基本因素，这是因为通过发表于不同时间的言论展开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把握福泽思想所反映的历史趋向。要在近似的逻辑中发现思想的质变，就必须弄清楚貌似相同的逻辑在不同著作中所占的地位，以及它们构成哪些见解的基础，为此、需要对每部著作加以编年的和总体的考察。

① 前引《福泽谕吉的哲学》。

很难将某种历史理论简单地归入上述态度之一。理想的研究方法，应该将两者加以统一。事实上，人们在历史研究中常常并用这两种态度，至于应以何为重点，从目前的思想史研究水平来看，还是个难以驾驭的问题。本书将更多地留意于后一种态度。因为前一类研究，已有羽仁、丸山的优秀成果公诸学界，我只是在补充的意义上，再从这一角度作些研究。例如，福泽在社会价值上对统治者勇猛批判和关于消除官尊民卑弊端的主张，在明治初年至他晚年约 30 年的论著中是一贯的，但这些见解在《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的整体结构中所具的意义，与在《藩阀寡人政府论》（1882 年）或《为何建立政治社会》（1890 年）里的作用就有很大差异。我试图穷究这一差异。也就是说，福泽始终没有改变独立自主的主张，但他阐发这些主张的所有言论，在不同时期起着不同的客观作用。我希望弄清这些变化是在什么时候通过怎样的契机发生的。

为着手这一考察，我拟以福泽面对政府与人民间的基本矛盾所取的立场为轴心，联系其思想内容，对每部著作的历史作用作一探讨。福泽常常标榜自己对政府和民众均不偏不倚，始终站于中间立场。但随着政府与民众的对立

不断激化，他那中间立场作为反映这种变化的晴雨表而显得摇摆不定。动摇是中间立场的必然产物，尤其是欲对形势产生积极作用的主体意识越强，就越是会基于对形势的判断而不断地调整立场。正因为如此，在福泽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其立场和态度表现出千变万化的景观。福泽与政府时而紧张时而和缓的关系，可以说正反映了他所持立场的特征，所以我在避免叙述冗长的同时，特别注意他立场和态度的演变。

我曾把福泽在明治初年的立场归纳为：“即使是他们（明六社同人——著者）中最有操守、坚持在野立场、对封建制的批判远为彻底的福泽，其本质也不属于近代市民革命的范畴，而仍应算作启蒙专制主义。只是在通过卓越地能动地汲取欧美思想而形成自己的有体系的理论，并将它与日本的现实密切地结合使之富有蓬勃的生命力，从而创制出自觉地推动明治国家前进的国民（庶民）精神这一点上，福泽思想有其独特的意义。致使福泽未能超越这一界限的社会原因在于作为人民革命力量的近代市民阶级还没有成长壮大。”^①

① 《明治维新》，第303页，1951年

揭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与天皇制绝对主义的关系，也是本书面临的课题之一。福泽曾批评过那种企图使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原封不动地在日本重演的思想。通过明治维新产生的天皇制权力具有怎样的历史特点，天皇制指导的现代化具有怎样的性质，这都是战前关于日本资本主义的论争中没有定论的课题。我认为，根据 1889 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建立的国家体制，意味着天皇制权力的最终确立，而天皇制权力在本质上应属于绝对主义。但它与欧洲 16、17 世纪的古典绝对主义明显不同，其作用也受到 19 世纪中叶的世界史条件——产业资本主义已高度发展并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严格限制。如前所述，福泽思想的意义在于“创制出自觉地推进明治国家的国民精神”如果只是古典绝对主义，那么一个思想家的一生就不可能成为如此重大的政治、思想课题。通过考察福泽思想与统治权力的关系，进而研究天皇制权力和明治国家的性质，也是本书所要探究的课题。

下面，拟按时间顺序对福泽思想作一审视，因此，依据的史料也限于有关时期，在此基础上，看是否能够引出什么新的结论来。

第二章 作为幕臣的进退

第一节 与藩、幕府的关系

1866 年幕府^①第二次讨伐长州^②之际，福泽向幕府提出借用外国军队讨伐长州藩的建议书。这件事使了解福泽性格和思想的人无不为之惊愕。福泽把谋求祖国的独立看作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为了伸张国权而主张平息国内的纷争，可以说这也是他思想的核心所在。

《福翁自传》描述了福泽此期的行为和

① 幕府，日本封建社会中实际统治全国的军事独裁政权（1192—1867），首领称征夷大将军。这里专指德川幕府（1603—1867），也称江户幕府。——译者

② 讨伐长州，指幕府于1864年和1865—1866年两次发兵讨伐反幕府的长州藩。——译者